



戰略與
國際關係



● 作者/Elbridge A. Colby and A. Wess Mitchell

● 譯者/張彥元

● 審者/彭耀祖

強權競爭時代來臨

強權競爭時代來臨

2019年6月29日，美國總統川普與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於日本大阪所舉行的G-20高峰會交談。

(Source: AP/達志)

The Age of Great-Power Competition

取材/2020年1-2月美國外交事務雙月刊(*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20)



近期美國外交政策混亂，許多分析家直言美國正在失去其全球領導的地位，實則不然。未來美國將不再擁有絕對經濟與軍事優勢，而中共的崛起與俄羅斯的重振將削弱美國，並重塑對其有利的全球政治環境，美國當前的所作所為，恰是為這個新時代做好準備。

根 據報導，美國現行外交政策一片混亂。在這些報導中，許多更以頭條新聞宣告美國在全球領導地位的消逝。許多著名專欄作家更經常第一時間，假設性地報導美國總統川普正對抗戰後自由秩序。據信，這已對華府在世界的地位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損害。

但是，若在這些紛擾現象中換個角度來看，將出現一個不同的局面。事實上，美國正在為一個新時代做好準備；這個時代的特徵不再是由具絕對優勢的美國主導一切，而是崛起中的中共以及一個急欲重振的俄羅斯，正試圖削弱美國的領導地位並重塑對其有利的全球政治環境。

如此局勢轉變已受華府當局關注一段時間。歐巴馬總統時代所採取的因應作為多屬被動形式。而川普政府則已邁出重要的一步，認知到在大國競爭之下，美國必須澈底重新建構其外交政策，並以此作為其正式戰略文件基礎。未來當歷史學家回顧美國在21世紀初所採取之諸般作為時，深信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事件，乃會是華府重新聚焦於大國競爭的方式。在今日經常有如走馬燈的頭條新聞背後，正是這種轉變，以及由其所引發美國在軍事、經濟與外交行為等方面的政策重新調整最為人矚目，且未來無論總統屬哪一個政

黨，這種轉變均可能長期導引美國外交政策。

無所作為的代價

多年來，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家不斷爭論中共崛起與俄羅斯復興對美國利益具有之意涵。自從最近一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與〈國防戰略〉採用「大國競爭」一詞以來，該詞已廣泛流傳而成為時髦的流行語。此刻，挑戰之本質，誠如一個經驗事實所示，應已非常明確：美國今日所面臨的競爭對手，比近代史上任何時期的對手都更為強大且野心勃勃。圖謀稱霸印太地區進而睥睨全球的中共，可能將成為美國歷史上所面對最為強勁的敵手。俄羅斯或許尚稱不上旗鼓相當，但事實證明，其目前投射能力自冷戰結束以來已有了出乎意料的進步。今日，俄羅斯意圖在曾經屬勢力範圍的部分東歐地區重振其優勢，並希望加速終結西方在世界整體的主導地位。俄羅斯具有破壞性的潛力，部分原因乃是源自其為滿足自身利益的舉措，引發就長期來看有利中共勢力的系統性危機。

直到最近，華府才開始考慮如何因應這些挑戰。由於美國絕對的經濟實力與軍事優勢，因此在蘇聯解體後整整一個世代之間，民主黨和共

和黨政府均未認真看待有可能面對另一個實力相當的競爭對手。在當年的美好歲月裡，強權對抗已成往事，地緣政治已不再受重視。世界其它強權國家已轉變成為共同對抗核武擴散、恐怖主義乃至於氣候變遷等種種「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問題的夥伴。

但是，中共和俄羅斯的諸多行動，慢慢戳破了這種樂觀的看法。中共在轉變成為全球商業中樞的同時，其所採取如強制技術轉移、強迫性聯合經營，以及公然竊取智慧財產權等經濟差別作法，非但未大幅改善，反而變本加厲。此外，中共還進行了歷史性的大規模軍事建設，旨在主宰亞洲。長期來看，其目標乃是向全世界投射戰力，並致力於透過一帶一路倡議與各種相關計畫擴大其影響力。於此同時，俄羅斯重建其軍隊，入侵喬治亞、吞併克里米亞，在東烏克蘭煽動日益惡化的叛亂，並為重振其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的軍事、經濟和外交影響力，展開一場有系統行動。

然而在華府，多數人長期以

來均拒絕承認這個新現實。非僅如此，美國的領導人還繼續昭告與俄羅斯進入「接觸交往時代」(era of engagement)，並宣揚北京有可能在國際體系內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前者乃始於2009年俄羅斯入侵喬治亞後幾個月，美國「重啟」對俄關係。後者則體現在美國不斷努力深化與北京的關係，部分人士甚至渴望建立一個僅有美國與中共的「兩國集團」(G-2)來領導國際社會。但是，中共在南海肆無忌憚地將島礁軍事化，以及對南海以外地區益發強硬的姿態，最終迫使華府重新評估其對北京的臆想。2014年，俄羅斯奪取克里米亞之舉，讓所謂「重啟」殘存的一切蕩然無存。歐巴馬政府後期，美國在路線上的嚴重偏離已然十分明顯。

然而，應運而生的政策轉變並非是美國在戰略上的深謀遠慮，而只是事後諸葛、反制因應的調整，已造成大量傷害。由於美國珍惜表象上的穩定，更甚於謀求明確之國家利益，因此對中共明目張膽地竊取美國的智慧財產，甚至是政府機密，以

及緩步佔取南海的意圖，多年來均視而不見。為了招攬俄羅斯共同支持一個顯然被其總統普丁所蔑視的國際現狀，華府向克里姆林宮示好，但卻無意間助長了克里姆林宮在其領土重劃之路上的氣焰，也讓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東歐前線的盟國深感不安。美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東亞與歐洲的盟國開始懷疑華府是否願意為其自身奮然而起，更遑論為維護盟國挺身而出。

路線修正

平心而論，川普政府比過去歷任政府更為務實、坦率，也確實說到做到。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曾於2018年在《金融時報》撰文指出，「川普或許是個偶見於歷史的人物，代表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並迫使這個時代拋開其過去虛偽的表象。」美國的新政府揚棄了單極體系(the paradigm of unipolarity)，創造出一個用以闡明新大戰略的空間。在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2018年〈國防戰略〉，以及從屬之印太與歐洲戰區等區域戰略中，美國明確表示目前認



為與中共和俄羅斯的關係具有競爭性，且將致力保持競爭優勢。正如時任美國國防部長馬提斯(James Mattis)與國家安全顧問麥克馬斯特(H. R. McMaster)明確指出，大國競爭將成為美國國家安全的主要焦點。

如此轉變背後的概念並非盲目對抗，而是維護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標：維護各國自由，特別是美國盟國，使其免於受區域主要霸權影響，從而能規劃出自己的國家路線。正如川普政府在各項戰略聲明中明確指出，此願景刻意具備普遍性：它適用在承受來自北京不斷增加之經濟和軍事壓力的亞洲國家，也適用歐洲大陸的核心同盟國以及其周邊附庸國。但是面對不斷崛起且極為強大的中共與伺機報復的俄羅斯，美國唯有確保自身實力與經濟活力，在區域勢力平衡中保持優勢，並清楚揭櫫其利益與紅線，才能實現營造出一個自由開放世界的願景。

美國必須準備競逐對抗具備能力與決心的敵對大國。

美國國防部在許多方面都是

遂行此應盡之責的最前鋒。在其所公布之國防戰略、〈2019年印太戰略報告〉(2019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以及公開聲明中，美軍已明確表示其目前最為關注者，乃是如何有效地捍衛如臺灣與波羅的海諸國等國家，對抗中共或俄羅斯的可能攻擊，特別是防止以既成事實為基礎的侵略，即奪取無力抵抗的領土後，深溝高壘、進行堅守，使任何反擊都因代價太

高而無法遂行。由於五角大廈對此種攻擊發生機率的研判，因此正在調整其自卅年前「沙漠風暴」行動(Operation Desert Storm)迄今之作法，即逐漸將兵力集結至威脅區，且確定美軍已掌控全面優勢後才發起反擊，繼而轉變為一支足以於敵對行動開始之初，即擊退中共與俄羅斯攻勢的部隊。如塞爾維亞(Serbia)及伊拉克，儘管美軍從未能掌握全面優勢，但仍



能獲得勝利。五角大廈的預算需求亦據此漸漸開始轉變。短程戰鬥機與大型兩棲船艦因易受到敵方攻擊，繼而代之是更擅匿蹤的長程轟炸機及潛艦、無人船艦與飛機、長程陸基飛彈及火箭等，並大量囤儲精準、穿透彈。軍方正對此新型態作戰架構進行實驗，規劃如何呈現新型態部隊並且有效發揮其新式戰力。

於此同時，經濟領域亦已出

現戲劇性的轉變。直到幾年前，美國官員仍認為美國無法承受美「中」經濟關係的動盪。與北京之間保持穩定似乎至為重要，故不能因要求公平對待美國公司而損及這個關係。今日川普政府在兩黨大力支持下採取行動，對自中共的進口商品加徵關稅，俾使北京停止其扭曲市場的貿易作法；即便未能奏效，至少這些進口產品的價格將會反映中共對美國公司和

工人採取不公平作法需付出甚麼代價。據報，這些懲罰措施會讓美國中產階級和勞工階層痛苦，但中共不公平的貿易作法亦將承受相對壓力，且繼續無所作為只會使情況更為惡化。相反地，美國所加諸的經濟壓力已使亟需調整的貿易政策列入議程。

類似過程也在歐洲展開。長期以來，儘管貿易逆差不斷加劇，美國一直猶豫不決是否正視歐盟對美國產品的單邊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等問題。由於不願接受如此現狀，川普政府試圖通過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獲得過去歷任政府以委婉手段和漸進主義所未能收致的效果。然而，這種激進作法亦造成巨大的附帶損害，跨大西洋關係的潛在溢出效應，可能損及雙方共同努力對抗中共之作為。

於此同時，美國則正在強化可供使用的強大商業工具。川普政府及國會已全面改革海外私人投資公司，為亞洲和歐洲

2020年7月6日，美海軍雷根號(USS *Ronald Reagan*)及尼米茲號航母打擊群於南海巡弋。(Source: AP/達志)





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玫瑰園記者會與出席記者對談。(Source: AP/達志)

的弱勢國家提供除接受中共融資以外的替代方案。2018年10月間通過的「善用投資促進發展法」(*Better Utilization of Investments Leading to Development*)，簡稱「建設法」(*BUILD Act*)，為各國提供替代性的融資選項，使其免受北京一帶一路倡議此一黃金手銬的箝制。此外，由國會兩黨領袖共同提出的平等法(*EQUITABLE Act*)要求中國大陸公司遵守與美國公司

相同的資訊透明規則，方能於美國證券交易所上市。兩黨的重量級議員均表示，如果北京違反其對香港自治的承諾，他們將撤銷香港在美國的經濟和貿易特權。最後，美國官員總算得以開始針對有關中共之電信投資，積極向其它國家提出警告，因為這些投資可能會幫助北京獲得並利用他國的敏感科技。

外交領域的優先順序也有所

改變。經過數十年對中東不成比例的關注之後，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與2018年〈國防戰略〉實屬遲來的修正措施。這些文件指出，亞洲和歐洲是當今美國最大的威脅所在。美國的主要目標應該是防止這兩個地區的大國獲得足夠影響力，並將區域勢力平衡轉變為對其有利的態勢。這是一個令人欣喜的改變，不同於自冷戰結束以來的任一國防戰略；過去皆以

某種方式淡化了大國競爭。

在執行面上，有兩項外交作為特別明顯。首先是川普政府在較大型且有能力之聯盟國家協助下，致力與強大的競爭對手分庭抗禮。在歐洲，相關作法使其各國的國防支出僅2019年即調增至340億美元，其中也包括不願增加國防費用的德國。在亞洲，美國明確表示將防衛菲律賓在南海的飛機與船艦，增加對臺灣的外交和軍事支持，並深化與印度和越南的政治及軍事關係。這些國家與華府一樣，對中共渴望成為區域霸權一事深感憂慮。

其次，美國已開始對過去一直未加重視的區域，發揮其經濟和政治影響力，並對中共和俄羅斯持續經營的數個地區，進行接觸、交流及援助。美國已加強在中歐、巴爾幹半島西部以及地中海東部的外交影響；在這些區域，美國因缺席所留下的真空，讓中共和俄羅斯得以利用當地的政治裂痕提倡威權政治。美國已在這些地區的一些國家，加強支持良善治理與打擊貪腐、採取反制俄羅斯宣傳的作為、擴大青年與文化交流，並就與北京和莫斯科結夥的長期性風險，向友盟提出警告。在亞洲，華府透過建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強化與北京融資競爭的能力，透過「建設法」提供新的融資管道。此外，美國特別透過「印太透明倡議」(Indo-Pacific Transparency Initiative)，在此區域提倡良善治理以及反貪腐工作，並公開譴責中共對西藏和維吾爾少數民族的對待方式。同時，美國也更加關注太平洋島國，例如密克羅尼西亞、巴布亞新幾內亞以及所羅門群島，這些國家特別容易受到中共壓力影響。

前述並非為了降低華府日常所見的亂象，也並非為了捍衛政府的各項政策。無論是與伊朗交鋒、持續在阿富汗駐軍，或如美國政府中部分人士計劃干預委內瑞拉情勢，這些作為在一個大國競爭的世界中，都與獲致成功之道大相逕庭。且若對盟國要求過多，華府將招致風險，削弱其與競爭對手相較之下，唯一且最大的競爭優勢。此外，美國尚未踏上成功之途；相反的，目前進展並不平均且時有間斷。儘管如此，美國現在有了一個重新調整其外交政策的範例，且獲得了兩黨的支持。這個範例，至少其基本宗旨，將可能延續且由未來政府採行。

當務之急

這就是華府現在所面對的情況。美國已經表明，有意願與能力在軍事、經濟和外交上採取更具競爭性的方式予以因應。在美國國內，路線調整所獲得兩黨支持的程度遠高於過去，特別是美國政府對中共所採取的強硬措施，更在國會受到民主和共和兩黨多數議員的支持。同樣地，兩黨議員經過多年的猶疑不定後，終於形成共識，認為克里姆林宮所帶來的威脅不但嚴重，且必須予以制止。在國外，華府的新訊息亦已引發重大調整。歐洲盟國增加了國防開支，並維持對俄羅斯制裁的統一戰線。美國與印度、日本以及波蘭的國防關係已經大幅升溫。此外，多家跨國公司現正將其供應鏈分散到中共以外的地區。前述種種僅是數項事例。然而，這可能只是一個開端，相關作為可能將持續數十年。並無任何跡象顯示中共會放棄圖謀主宰亞洲；莫斯科也不太可能修補



與西方的關係。如果有什麼與過去不同之處，那就是俄羅斯正在深化與北京的合作關係。因此，美國必須準備好進行長期抗戰。

為了阻止中共對主導亞洲以及其它地區之圖謀，美國必須以較過去更為緊迫的態度，維持有利的區域勢力平衡，且在亞洲和歐洲應建立並支持必要之聯盟關係，以此做為戰略核心。明確而言，這個目標無法僅憑藉著禮貌的要求和再保證而達成。由於美國不太可能假裝其擁有同時制衡中共和俄羅斯的能力，因此必須以堅定的態度向盟國與新夥伴提出更多要求，且須在必要時實際施壓。於此同時，倘若華府在政治上造成嚴重不和諧，導致聯盟內部結構逐漸遭到破壞，則恐難以鼓勵盟國挹注更多資源。

回到過去令人陶醉的歲月已無可能。然而，獲得更多資源挹注的需求則十分迫切。華府在後冷戰時期的盟國架構仍反映在「單極時代」(the unipolar era)形成的配置；當時美國在保證夥伴國的安全上，幾乎不需要協助。除了如波蘭和韓國等少數值得稱許的例外，美國的盟國，特別是相較中共和俄羅斯，就算沒有完全解除武裝，也都只是輕度武裝。在對抗中共方面，日本在任何成功的防衛態勢中，都將扮演核心角色。然而，日本今日的國防支出卻大致等同於1996年，而中共的國防支出則已增加了十倍。臺灣所面對共軍的威脅更甚於其它任何地方，但其國防支出過去廿年幾乎沒有增加。在歐洲，如果德國於1988年同意部署其所引以為傲的15個現役和戰備後備師其中一小部分，則將大幅減輕俄羅斯對北約東部成員國所形成的威脅。時至今日，柏林幾乎連一個師都

難以召集。目前美國的國債超過23兆美元，已無力再獨自揹負所有責任。值此之際，如何勸服美國的盟國多盡一份心力，同時不對這些盟國施加太多壓力，將是未來一項重要的挑戰。

另一個問題是，美國的聯盟，特別是在亞洲，究竟應該是何種形式。美國無須在亞洲複製一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重點是要組成一個聯盟，遏止中共稱霸區域的圖謀。這個聯盟可混合正式的盟國(如澳大利亞、日本、菲律賓和韓國)、類盟國(臺灣)，同時對不涉及正式安全保證的夥伴，則應深化合作關係(印度和越南)。在此聯盟中，華府與新德里和東京的關係將具有鞏固聯盟作用，但面對強大的中共，欲維持此一聯盟，美國將必須扮演積極領導的角色。於此同時，東南亞較弱小的國家可能將成為與中共戰略競爭之重點。

在歐洲，美國已擁有一個非常成熟的聯盟架構，亦即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美國應維護如此架構並使其合乎時代需求，令其更能符合中共和俄羅斯所形成挑戰之規模。在俄羅斯奪佔烏克蘭領土後，北約已改造其指揮結構，並修正自1989年以來一直未調整的兵力部署態勢。但是，欲阻止俄羅斯未來在其邊境製造既成事實的企圖則仍須更多變革。特別是美國需能夠迅速部署之部隊，於俄羅斯奪取領土之初即能與其對抗。鑒於美國大量的資源將被牽制在亞洲，歐洲的北約盟國將必須強化其軍隊與美軍整合之能力，以阻撓俄羅斯的突襲。

在激發歐洲抵抗中共在貿易上的掠奪作法，以及其招攬夥伴進行欠缺考慮的基礎設施計畫等方面，華府所做的努力不甚成功，部分原因乃是



北約旗幟與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及歐盟旗幟共同矗立。(Source: AP/達志)

由於與歐洲在貿易上的分歧。然而在此方面，跨大西洋兩岸的團結不可或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且雙方將妥善解決彼此爭執。歐洲的政策制定者應體認到其不對稱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對地緣政治所造成之長期後果，並停止針對大型美國公司實施歐盟的監管制度，於此同時卻讓中共和俄羅斯的國有企業擺脫困境。無法做到這一點將會損及未來歐洲若面對中共和俄羅斯脅迫時所應具有之彈性。美國官員則應理解，爭取讓民主盟國之間的貿易更為互惠互利，其急切程度不比與中共展開貿易戰。美國不可能同

時處理每一個不平等的貿易關係。建立一個對中共的統一戰線仍應是華府的當務之急。美國與印度和日本的經濟關係亦是如此。

此戰略的首要目的既非使美國和中共經濟完全脫鉤，也並非要迫使美國的盟國與夥伴選邊站(儘管建立一個包含亞洲與歐洲盟國的低關稅壁壘西方貿易區應為美國的長期目標)，而是為了加強保護智慧財產以及敏感科技，進而減少中共對美國和其它地區的經濟影響力。加拿大、日本、菲律賓、南韓、臺灣、中歐和東南歐諸國，以及許多其它國家，已感受到中共

經濟脅迫的壓力。對所有國家而言，有必要與中共經濟進行廣泛融合，但各國必須限制北京將如此經濟融合所具有之風險轉化為影響各國的能力；此舉並非有利於華府，而是為各國自身主權之故。

此外，華府應設法使北京與莫斯科之間保持一定距離。美國的國家經營方針向來認為，讓這兩個主要的歐亞強權國家協力同心誠屬不智，然而這可能正在進行中。由於俄羅斯與西方頗為疏離，顯然正倒向中共，甚至不惜斷傷其主權。莫斯科近期欣然接受中國大陸的電信巨擘華為進入俄羅斯，且兩國已深化能源與軍事方面之交流，即為前述情況之實例。就目前而言，離間俄羅斯與中共不太可能成功，因此美國將必須為嚇阻做好準備，以待更有利的時機。美國應加強北約在波羅的海與中歐對俄羅斯之嚇阻能力，同時採取制裁措施，懲罰俄羅斯在敘利亞和烏克蘭等地的侵略行動。未來與俄羅斯之關係倘若能因利益而趨緩，其原因將會是出自莫斯科認為以武力重振其在蘇聯時代之影響



力，其代價過高而不值一試。

然而，即便有盟國協助，在面對中共和俄羅斯時，美國亦將無法取得曾在單極時代對其敵手所擁有之軍事優勢。如此作為不僅將徒勞無功且適得其反。華府真正所需，乃是抵抗對其盟國與夥伴國成功突襲的能力。這意味著提供足夠防禦使同盟國家保持同心一致。更重要的是，這也意味著確保這些同盟國家不能被佔領，特別是不會在

「既成事實」的情況下遭到佔奪，或因遭到封鎖和脅迫而陷落。此戰略可稱為「阻絕防禦」(denial defense)。拒阻中共和俄羅斯奪佔臺灣或波羅的海國家誠非易事，但在今日精準彈藥與情報、目標獲得與資料處理能力強大的世界仍屬可行；然而部隊必須能承受初期攻擊，並協助拒阻中共奪取臺灣，或俄羅斯佔領波羅的海國家領土之能力。

1名伊拉克士兵正在聯軍
撤離卡雅拉(Qayyarah)空
軍基地的典禮上警戒。
(Source: AP/達志)



為達成此一目標，表示必須暫時擱置其它承諾，甚至做出取捨。在一個單極世界中，華府或許可以在所有地區都能獨當一面，如同一個控制著世界的巨人，但是在一個大國競爭的時代，如此將完全進退失據。相反的美國將必須減少對次要與周邊地區所投注之心力。

以美國在中東的部署為例：華府不應試圖穩定該地區並在當地支持「全球規範」，而應將重點

聚焦於尋找具有成本效益的方法來打擊跨國恐怖主義。同樣地，改革如伊朗等國家之政府不能成為美國的目標；阻止這些國家成為波斯灣的霸權即已足夠，其所需之努力與資源亦更少。借助當地代理勢力並多仰賴海外部隊以逐漸減少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和敘利亞的部隊，將可釋出更多的戰力。

不再意氣風發

川普將繼續在推特和其它場域衝撞中共，順了姑意，卻逆了嫂意。許多人則仍將繼續對中東日益發生的危機感到束手無策。與此同時，美國正在進入一場將很有可能曠日持久的鬥爭，亦即角逐決定21世紀世界如何運轉的權力。與不久前的情況相比，即將到來的時代

將更不容許美國驕矜傲慢與鬆弛無備。認知此點將促使美國對其軍事、經濟，以及外交優先順序進行早就該做的重新評估，而未來的政府將需要持續推進此工作。

然而，如此作為將需要歷經痛苦的權衡、取捨與犧牲。這意味著放棄過去軍事優勢無可匹敵的舊夢，在大夢初醒後面對不再適用的武器載臺，並且要求美國的盟國在資源挹注上做出更大貢獻。這也意味著美國須在不損害其對國際自由貿易所行之承諾下，強化戰略相關領域之科技優勢，並更嚴密關注亞洲和歐洲，且無須在意其它區域。回到過去令人醺然的意氣風發；彼時美國認為其對手意圖良善；彼時美國持續經常削弱其攸關國家安全的經濟政策，並且以表面上的政治團結為名，掩蓋盟國之間危險的缺點。然而上述一切將不再是選項。而抽身撤退以求完全置身於地緣政治競爭之外亦不可能。美國唯有在最具關鍵性之地區，確保有利之平衡勢力，並且有系統地為其社會、經濟與盟國做好準備，方得以與有能力且具決心的敵對大國進行長期競爭，如此才能一如過去達成保證自身安全與自由社會繁榮的目標。

作者簡介

Elbridge A. Colby 係馬拉松計畫 (the Marathon Initiative) 負責人之一，曾於 2017 年至 2018 年間擔任美國國防部戰略與軍力發展副助理部長。

Wess Mitchell 亦係馬拉松計畫負責人之一，曾於 2017 年至 2019 年間擔任美國國務院歐亞事務助理國務卿。

Reprint from *Foreign Affairs* with permission.

